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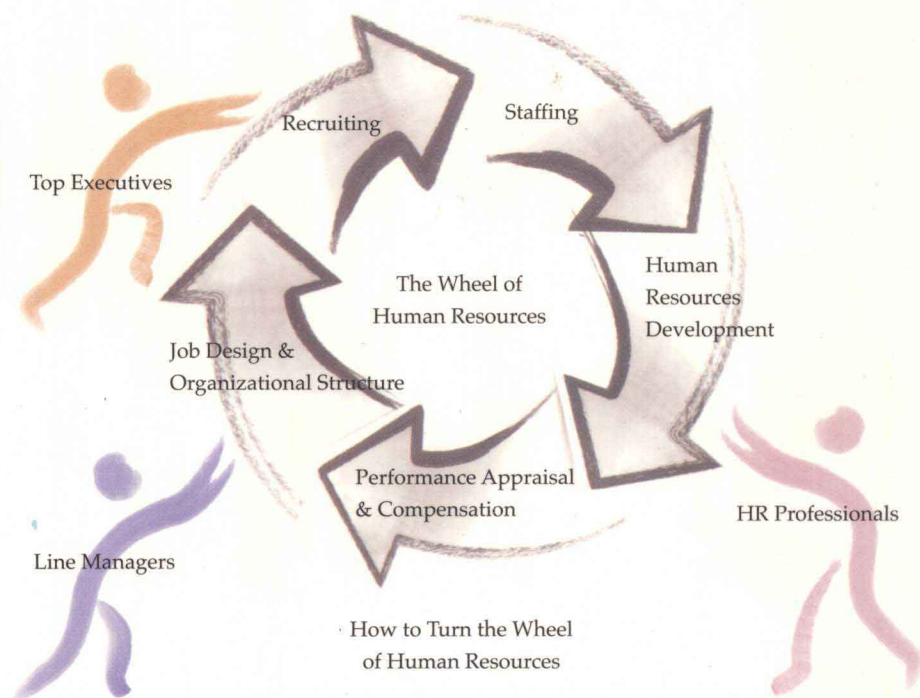
中西融贯
知行合一

北大商业评论

PKU
Business
Review

■ 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

■ 金融风险与金融改革：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对策



■ 德隆地震

■ 东亚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 中小企业：你找到“利基”了吗

■ 转型中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股份经营制度的功过与晋商兴衰

第四辑

2004/08

No.4
08/2004
PKU

Business Review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商业评论. 第5期/厉以宁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

ISBN 7-301-07771-8

I. 北… II. 厉… III. 企业管理—丛刊 IV. F27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85565号

书 名: 北大商业评论

主 编: 厉以宁

责任编辑: 何 潇 叶康涛 林君秀

封面设计: 王东魁 毛 毛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771-8/F270-55

出 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邮 编: 100871

网 址: www.pkubr.com

电 话: 010-62752926

排 版 者: 《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部

印 刷 者: 北京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部

85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10.25印张 130千字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80.00元

《北大商业评论》征稿启事

《北大商业评论》秉承北京大学严谨治学、开风气之先的理念,面向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和关注实践的学者,关注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现象,注重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结合,探索中国企业运行规则,以期实现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相互促进,并立志成为中国最权威、最具有影响力的高档评论性刊物。

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刊发展,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稿件。稿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具有创新性和理论深度,同时又理论联系实际的管理学文章;

介绍管理领域中新出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工具和管理技巧;

针对企业某一管理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国际上最新兴起的管理理论和国际工商管理界的最新动向。

《北大商业评论》期待拥有丰富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管理学者、咨询专家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向本刊投稿。稿件一经刊用,将按同类刊物最高稿酬标准付酬。

投稿地址: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105室《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部

邮 编: 100871

电 话: 010-62759367, 62758178

电子信箱: bbr@gsm.pku.edu.cn

网 址: www.pkubr.com



关 系 到 每 个 人

——列宁格勒大学女教师安德烈耶娃在
《青年近卫军》杂志上的文章（摘要）

（1989年7月）

如何确定形成我国当前形势的社会政治坐标呢？这不仅是一个难题，而且在当前也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有一切根据推测，在我国积极活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在改革的掩护下已经开展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那种进程。考虑到先前那些失败者的经验，他们巧妙地利用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和改革所提出的口号。也象在上述国家中一样，经济的极度紧张困难成了他们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借口和原由。

无怪乎，开始向苏共章程和纲领发动进攻，说什么它们已经“不符合当前的要求”。苏维埃国家的保卫职能也遭到攻击。

现在人们议论说，“人民买不到东西”，“商品质量差”。这种议论不仅意味着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专业上无能，而且也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定社会主要生产力——劳动者同生产工具公有制之间相互关系机制的问题，仍象4年前那样迫切。

经济改革官方领导人之一阿巴尔金院士不久前被迫承认，必须恢复最近几年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已经削弱的计划原则，因为笼统地放弃集中的全部计划工作有使改革决定性阶段的工业管理遭到损失的危险！阿巴尔金断言，“当前形势正在推动回到行政命令体制”。听到这个报告后，部长会议主席得出结论：政府在着手经济改革时，并无科学制定的计划。那么当时是怎样决定进行“试验”的呢？近三亿苏联人都卷入这一试验。我们几十个科学院研究所和其他经济研究所以及国家计委和计划机关，除了领取工资外，当时又干了些什么？难道这不是任何思维健全的人自然而然提出的问题吗？

我源源不断地收到为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的信件。结果是，对于格鲁吉亚女中学生来说，对于鲍曼高级技术学校的学生来说，对于到我这里来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来说，对于来自巴统市师范学院、我任教的工学院的同龄人来说，对于来自我们辽阔的祖国许多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来说，我有幸成了无意中的听取忏悔的牧师。年轻人不安地在思考着我们大家都出了什么事。我们长期期待着到来的改革是怎样开展的？改革在现实中产生了何种趋势？换句话说，我们正在把“在战斗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什么？改革作为从本质上生机勃勃地更新社会的现象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阶段，意味着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基础。不管怎样，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恰恰是这样解释改革的。例如，这些文件指出，在更新社会主义和加强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不能不加强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即今天在新

的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活动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我们记得……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国家在4年内粉碎了白卫军和武装入侵者。苏联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用了4年时间才带领热爱自由的各族人民在1945年制止了法西斯的致命性和全球性的危险。大致同样用这样一个期限才恢复了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经济，使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我们谈改革，说的比做的多，这种状况也持续4年了。人们甚至想出了一个术语：大谈改革……我们是否想到我们是在大谈什么：大谈对社会主义创造可能性的信心、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现已清楚，有些著名经济学家和所谓的改革实践家开始是过分喜形于色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前景，说什么要解决各项基本任务只需两三年的时间，现在好象又恍然大悟似的，又呼吁再忍耐些，别指望很快取得成效，做好改革需要进行几十年和作出巨大牺牲的准备……这种情况是值得警惕的。

不但如此，还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我们先是应当“摇撼那棵老树，然后把它连根拔出栽上一片新树林和获取成果”。在我看来，这种扭曲社会主义的行为本身不可能不是“连根拔掉”社会主义的原因。我们不应该这样。不管我们怎样评价通过人民紧张的劳动建成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尽管还远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反正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尤其是当我们从今天的高度来评价社会主义的时候。

今天，实际上在一切宣传的讲坛上都把民主化和公开性称作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好像民主与公开性具有自给自足的和至高无上的作用。无疑，民主与公开性在开展改革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它们也只是为解决各项具体的社会问题服务，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当然，当我们谈到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范围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呼吁保留“禁区”和使历史的“空白点”永久化。这里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就其整个意义和权利来讲，公开性不可能是目的本身，不可能是为公开性而公开性。因此，在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公开性的界线是变化和灵活的。众所周知，在军事冲突的危机现象的时期，公开性到处要受到限制。公开性不能涉及军事机密、国家机密和科技秘密。公开性也具有哲理和道德界限，其表现为：任何信息都有客观性、可靠性、真实性、可证实性和责任性。其反面为谎言、主观主义、不可证实性和随意性。请原谅我重复这一明显的道理，然而，在它常常受到无视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后者在《星火》、《莫斯科新闻》、《青春》、《苏维埃文化报》、《涅瓦》和某些其他刊物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遗憾的是，不可证实性和蛊惑宣传竟成了大部分青年人的、而且不仅仅是青年人的刊物和电视报道的名片。

我认为，公开性之河需要认真净化，使它成为一条洁净大河。一小股浑浊的流水能够，甚至不可避免地变成恶臭的沼泽地，或者肮脏的死水洼。实际上，这能够使难以控制的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获胜，而自发势力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则孕育着人们的悲剧和社会动荡。无边无际的公开性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会产生货真价实的、而不是“带标签的”反改革势力的宣言。难怪北约活动家、皮诺切特、博塔和许多其他不赏识共产主义的人正称赞我们的这种公开性。舆论工具不仅反映、而且还组织社会生活，这难道还需要指出吗？

扎斯拉夫斯卡娅在领取西德奖金时曾发言说，改革“应当确保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

间的政权、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性再分配”。不清楚的只是，她打算为谁对苏联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原则性再分配”。

对党持否定态度的政治组织正在不无成就地解决扎斯拉夫斯卡娅所说的政权问题。因此，各级党组织用社会主义民主方法进行选举运动，而它们的反对者和竞争者则拿起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手段”的武器。众所周知，这种手段并不是什么体面和高尚的东西。其中许多具有政党性质的所谓“民主联盟”和“人民阵线”做出了表率。值得警惕的是，在这些“联盟”和“阵线”内部，正在成立渴望拿起武器的“战斗队”。它们从“影子经济”（客观上必然追求合法化）得到数百万卢布作为活动费用。它们对族际关系的尖锐化施加影响，挑动民族主义。在导致悲剧和呼吁脱离苏联的离心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倾向中，民族主义显得尤为危险。

不能不看到，恶意“贬低”斯大林及我们党和国家一系列其他领导人的风暴只不过是一个伪装了的盾牌，在这个盾牌的背后正在聚集已开始对列宁、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进行攻击的力量。正在形成的局势是，许多人弄不清楚，意见多元化到哪里算一站，对一切神圣东西的公开嘲弄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决非抽象的各代苏联人为什么而创造，为什么而受苦。那些曾经用大肆鼓吹勃列日涅夫的书来迷惑社会舆论的人，现在又组织了对人民历史的一概否定，并把这当做改革的主要成果。根据他们的倡议，美国人C·沙巴德在《星火》杂志的“圆桌讨论会”上预言道：“如果戈尔巴乔夫胜利，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史蒂文·科恩成了最可靠的布哈林政治传记作家，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伊萨克·多伊彻尔则成了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历史斗争的不偏不倚的公断人。

由“改革的急先锋”开始，掀起了一股远非“新纪实文学”的恶浪。从这一体裁中抛弃了祖国的优秀传统，而弗拉基米尔·奇维利欣在历史传记性小说《备忘录》中就在不久以前还成功地发展了这一体裁。他不仅以严格的史料和深刻的哲理，而且以对自己祖国的强烈的爱阐明了这种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纪实文学”的特点则是尖叫的好斗，耸人听闻的污辱，甚至准备用胸膛去堵那并不射击的枪眼。托洛茨基分子和西欧的一些叛徒的许多评价、发现和臆造又恢复了权利。现在有许多某个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最后的妻子”、“儿子”、“孙子”、“女婿”和“侄儿”发表文章，来支持这些“作品”。他们迫不及待地用自己的“回忆”来丰富“新纪实文学”并不丰富的内容，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甚至并不隐讳，他们靠的是模糊的记忆，道听途说，从儿时记住的某人的谈话等等。在《同行》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臆造被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来重复，所有这些东西越来越牢固，变成了“历史的难以征服的事实”。

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成了我党的主要历史问题专家之一，而他连一卷历史档案还未动，近几十年就在西方发表了近30部作品。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在自己的讲话中突出地集中了诋毁苏联制度、污辱我国人民的声明和评价，以至使阅历丰富的外国反苏专家也感到惊讶。“日丹诺夫液体”的发明者、世界工人运动研究所研究员尤·卡里亚金也是这个调门。我想知道，这些经常游历各个城市和乡村，就连出国也不放过的院长和研究员们有什么时间来为自己的工资而工作呢？他们那些见诸于报端，又在合作社组织的公开演讲中露脸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不

仅使他们得到了一些庸人的尊敬，而且也大大有益于这些“急先锋”财产上的成功。

舆论工具已经干了不少使老一辈和青年一代之间疏远和对立的事。例如，别斯图热夫·拉达一口咬定，全国60岁以上的所有居民都是改革的敌人，试问，他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调查结果呢？

把所有的苏联共产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说成是官僚主义者、保守分子、教条主义者和反对改革的人，用意何在呢？许多舆论工具抨击任何一个社会都珍视的许多精神和道德价值观念，竟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定律。苏联人所取得的巨大的军事成就和劳动成就被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这些成就却使苏联在军事上达到了与好战的帝国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无数的不负责任的诽谤一股脑地泼向突击手和模范人物。

难道还没有到制止假改革者的猖獗活动的时候吗？他们未必只限于“文字攻击”。在波罗的海沿岸、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发生的事件迫使人们思考这一点。现在有人已在企图使国民教育非意识形态化，煽动大学生拒绝学习能使他们客观和清醒地看待世界的马列主义原则，人民的防御意识遭到破坏。

我想，现在有必要对局势进行认真的社会分析，也许有必要进行辩论。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尖锐政治化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人们可以首先联合起来，坚决地、彻底地与那些不愿与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划清界限。机不可失！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我现在同过去一样，不认为自己在终审法庭上掌握了真理。但是，人们当面和来信向我提出的问题使我有义务说明自己的观点。

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理论文章

（1989年11月26日）

一、我们向何处去？改革的意义和使命

改革的历史几乎已经接近5个年头了。1985年四月决定所开始的革命性的社会改造进程正在进行，并且具有了新的更广泛的规模和新的深度。由于改革与我国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深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已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许多东西。

我们逐步更充分、更全面地意识到，我们建造了什么，正在改造什么，我们走向什么样的社会，自然也就相当明确地认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谈论这种改造，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

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采取实际步骤。

但是，在走上这条革命改造的道路之后，我们应该考虑这种改造的前景，考虑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理论原则。没有这种战略态度，不经常注意根本的问题，就不可能前进。

党在1985年4月之后的理论工作就是逐渐认识自己并相应地认识当前改革的长远目标。思考已走过的道路、革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确定社会主义新面貌的基本因素和苏联社会达到崭新状态的途径——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党已提出供广泛讨论。学者和实践家在改革年代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里所指的，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也不可能是给未来臆造一种有诱惑力的形象，然后把它强加于生活。未来不是来源于对它的幻想，而是来源于现在，来源于现在所特有的矛盾和发展趋势，来源于我们的共同工作。忘记这一点就意味着陷入纸上谈兵。

有人试图谴责我们，说什么我们缺乏实现改革构想的明确而详细的计划。难道能同意这样提出问题吗？我想，如果我们再把现成的公式强加于社会，对生活和现实情况强求一律，那我们就会犯理论上的错误。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特点，我们与它格格不入。我们按照列宁的教导行事。而按照列宁的教导行事，就意味着要研究未来将如何从当今的现实中成长起来，并据此来制订我们的计划。

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请看看我们近两年和当前的态度吧。一切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观点的变化，看到前进运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明白了许多事情，包括看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天，我们正在从根本上，一步一步地改变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我们明白，在这件事上应该进一步加快速度。但是不要有损于改革的内容和质量，无论是在经济范围的改革、政治范围的改革，还是在调节民族关系方面，都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提出来供我们选择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构想呢？并没有这种可供选择的构想。只能谈到两种今天显得非常突出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硬性的计划，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发号施令。另一个观点的基础是认为过去的道路似乎完全推翻了十月革命的选择，提出要使社会资本主义化。我们能够走这样的道路吗？不能，我们拒绝走这样的道路。其理由是尽人皆知的。我们看到了另外一条道路，通向社会进步之路。

今天，我们面前有一项复杂的任务：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在进一步制订改革的构想和政策时，在认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时，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整个宝库，需要这个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还需要根据其最初思想中所包括的深刻涵义来相应地认识自己。当然，还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现阶段的具体情况。要知道，从历史范围来说，十月革命之后的70年，对于真正形成作为人类进步新时代开端的新社会来讲，只是一个不长的时期。我们把改革看作社会主义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长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放弃专制的官僚体制，并形成真正民主的、自治的社会机体。

在这个就其实质来说是革命的过渡期时，各种成份和因素结合并交织在一起，相互

促进。在各种经济、社会形式和体制、各种意识形态倾向的竞赛中，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主义的新面貌。革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要延续几十年，直到21世纪的进程。

我们应该勇敢地、坦诚地面向未来。为了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来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密切相联的。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历史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生命力问题。只是说社会主义思想符合历史进程的逻辑，符合劳动人民多少世纪的夙愿，已经不够了。今天，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有人说什么社会主义思想是人为的抽象学说，因此没有前途，而体现社会主义思想并作为其论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要为我国社会的危机状况承担责任。

由于这个问题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

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悠久的传统。它使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包括革命运动充满活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使它摆脱了空想和纸上谈兵，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文明社会的进步和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历史性创造的合乎规律的产物提了出来。同时他们明确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同不文明的、平均主义的、“庸俗的”。（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区分开，把新社会的建立同物质生产、民主和个性的高度发展联系在一起。

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这种解释是最伟大的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全面发展。我们认为，过去的时期，社会思想基本上和大体上没有推翻和超出马克思关于在掌握物质生产和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王国”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从事于发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和结构。他们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实际社会生活和革命工人运动的实践，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证明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暂时性和向社会发展新阶段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革命的社会力量制订有理论根据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经典作家只提出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实践的可靠方针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一般理论模式，至于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体制，那就只是以最笼统的形式和主要是从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来谈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不能对个人崇拜和停滞年代社会主义的变形、对某些政治活动家的错误行为负责。这不仅是因为理论与这些事件相隔了100年，而且也是根据事情的实质来看问题。

这尤其涉及到某些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例如，有人认为，几十年来形成的对商品生产的消极态度是直接来自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认为，随着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价值规律就会失去其作为生产调节因素的能力。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不仅把抑止商品生产同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它同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联系在一起，当人和自

然之间形成“自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过程”的时候，人就不会成为物质生产的直接参加者。

这里的基础是发展科学和技术，而且是在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还没有达到的程度上。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水平所表明的当然不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新结构的早期阶段，而是它遥远的未来。如果迫使极端贫困的国家放弃商品货币关系，如果象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那样在最需要的东西普遍短缺的情况下过渡到直接的产品交换，难道应该由理论的创始人和理论本身来承担这样运用理论的责任吗？列宁曾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向直接产品交换过渡的途径来巩固社会主义的初步尝试是一个错误，我们还应研究为什么他的这个评价没有引起注意。

现在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资本主义能够吸收科技革命成果并形成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来保证其生命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多数居民创造很高的福利条件。当然，这不会消除其深刻的内部矛盾。

尽管马克思是首先看到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学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的人，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如果考虑到马克思预见的只是他所知道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他没有推测出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这种共存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完善，接受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量因素，使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些情况的综合，使资本主义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适应时代的挑战。

除此之外，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尖锐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过去没有出现过，因此经典作家不可能把它们作为研究课题，或者是它们当时只处于萌芽状态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制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现在，因为生产已经国际化，整个资本主义经营跨国化。全球性问题如此尖锐，以至于不考虑这些问题，目前就不能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的未来有一个现实的认识。

最后一点，存在着我们能够赖以决定我们发展目标的世界社会主义经验。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不久以前更广、更深、更现实。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除了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占有一席之地的还有世界其余部分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以及内容和动机都不同的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也和生活本身一样，其表现是多姿多彩的。因为甚至在每一个单独的社会中，社会主义也是千百万人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方案所进行的生气勃勃的创造。这在整个世界大家庭范围内尤其是正确的。多方案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每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民族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我们对社会民主派的经验也是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的。我们看到它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是文明社会进步和人民的历

史性创造的合乎规律的产物，这具有永恒的意义。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论证新社会的科学态度。但是要让这种态度。永远保持下去。

三、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

1、列宁：“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

谈到未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顾一下过去。有关我们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与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紧密相关。任何一场革命都不会按原计划进行，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准确无误地产生其参加者所期望的那些效果，人类历史的全部经验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谈论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说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29页）。弗·伊·列宁在谈到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时写道：“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5卷第458页）而且这番话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即将来临之际说的，见诸于《国家与革命》一书，该书包含他在革命实践之前对社会主义未来最详尽的描述。

当然，这并不是说，革命的实际成果，近的和远的，不应得到政治上和科学上的评价和重新评价。随着经验的积累，这种重新评价在不断进行。如果我们把过去72年国内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伟大的进步变化同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那我们也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以及其他不良现象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可能。

的确，我们的过去十分复杂。它融合了胜利与失败、开创与失误、光明与悲剧、革命热情、英勇的劳动和牺牲、强烈的希望与失落。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许多问题的根源就在过去。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无论是英勇的，还是悲剧式的，都是人类的财富，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胜利，就连我们的损失也将不是徒劳的，我们将会更加清楚，我们在前面有哪些危险，如何避免它们。

如今，随着对自己历史实质的深入认识，我们更加清楚，十月革命不是一场错误——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当时的现实抉择绝对不会象今天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动和血腥的军阀专政，是建立反动的反人民制度。

十月革命不是偶然，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向未来的伟大突破，是要求解决社会问题以利于人民，为最高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创造社会条件，使全体劳动群众参加自觉的社会创造进程，这一点也同样毫无疑问。

十月革命后的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第一次实践考验，开始积极探索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弗·伊·列宁的著作（从其著名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开始）首先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受到斯大林灌输的并且比他存在得更长久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影响，我们对弗·伊·列宁十月革命后著作的探索性估计不足，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

的改变被掩盖，因为这些变化好象会被视为软弱。事实上，列宁的探索并不是软弱的标志，而是力量的象征。在各种事件、破坏性的剧变中，列宁能够向生活学习，敏锐地捕捉群众的需求，总结事实并从社会进程中得出理论上的结论。

过去曾普遍认为，列宁似乎有一个完整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其实他根本没有一个这样完整纲领。众所周知，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重点被放在直接分配、劳动义务、严格统计和监督等成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有机成份的措施之上。但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列宁开始认识到：这项政策已经完结。只依靠革命唤起的热情是不可能率领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必须利用物质利益和与其相关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济经机制。从这一点出发，重新确定了社会运动的基本方向。其中主要一点是勇敢地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一种与教条主义观点和党内形成的普遍意见背道而驰的政策。

同样具有悲剧性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和进行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曾希望得到较发达国家无产者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俄国没有达到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那种济经发展水平。然而，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夕，其他国家并未爆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否意味着十月革命时不要夺权，或者在国内战争之后放弃十月革命？列宁对此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我们必须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尽快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经济和文化前提，即建立现代化工业和进行文化领域内的革命。换言之，就是要做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应该做到的那些。所不同的是，这要在苏维埃政权下做到。

弗·伊·列宁在逝世之前，已经制定出了自己合作化计划的初步草案，将文化革命构想同小生产合作化和改变一切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弗·伊·列宁制定出了自己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规划转变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

通过对他十月革命后的全部著作的分析，可以了解到，他所计划的这种转变是朝哪个方向进行的。最能向我们说明这一点的，大概是《论合作制》一文。前文中用的话即出自该文。他根据1917—1918年间经常重复的“统一工厂”思想，工人国家管理下的特殊垄断思想，得出了这样一个思想：“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如何实现这一切，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及其他社会形式，对这些问题，弗·伊·列宁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他只制定了一些草案、对此的看法。遗憾的是，这些在后来或被曲解，或在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被粗暴地扭曲。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将自己的规划和自己的方法强加给党和整个社会呢？这是评价我们历史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社会主义思想的官僚主义扭曲

在列宁之后，对建设新社会的形式和方法的历史性的必要探索表现为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斯大林善于利用群众的革命急躁情绪，利用一切群众运动所固有的空想与平均主义的倾向，利用先锋队急于达到预想目的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大大缩小了创造性讨论所出现问题和选择的可能性，导致统一，在统一中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和党的纲领范围内的意见和观点多样性的余地。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横

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之间，人道主义理想同实践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脱节，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结果。官僚主义的生硬的统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按自己的规律起作用。而理论应当完成被曲解了的意识形态职能，创造这些行动“正确性”的幻想，证明实践正确，在社会意识中描绘社会主义的完善的模式，好象这种模式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为达到“伟大的目的”，任何最没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证明是对的。“政治的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这就使政治失去道德基础，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和原则，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努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顽固地和社会意识中灌输“特殊的”有别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

与此同时，尽管存在种种扭曲，人民在自己意识的深处还是保留了对社会主义人道的理解，在各种可能条件下尽量推动社会主义向前进。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揭露了被称为“个人崇拜”的现象，斯大林失去了声誉，谴责了斯大林的方法。所有这一切迫使人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和党走过的路程。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方面，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极端行为，但却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地保留了官僚制度。官僚制度得以保存下来，是由于新的幻想起了作用。人们认为，只要消除了斯大林政权的极端行为就够了，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动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引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把已经达到的社会状态说成是“发达社会主义”，这样的评价就包含了实用主义的成分，但是，这里也就有很大的空想和夸大的比重，而主要的是保存了原有的官僚主义制度。

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出现了关于人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和关于劳动人民组织是这台机器的“传送带”的概念。所形成的机制后来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就其实质而言，行政官僚主义制度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对于社会来说已有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以致到最后社会被搞得不景气，到了危机的边缘。

那些年代通常被称作“停滞时期”，这样的评价看来远远不够。那是个错过时机的时代，为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那时对科学技术中发生根本变化的意义估计不足，并且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实际的步骤，尽管关于必须把科技革命尤其是科技革命最新阶段的成就同社会主义优越性结合起来的问题谈了许多。其结果是，在许多重要领域和方向上的普遍文明方面，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而西方国家已进入了第一个时代，就是高科技时代，就是科学与生产、与人们生活保障直到日常生活保障新形式的崭新相互联系的时代。

许多人试图在社会主义选择的本身之中寻找我们当代灾难和困难的根源，不是在革命的道路上，而是在革命的起因中，在革命的原则上寻找根源。苏共也在回顾革命的起因和原则，但不是为了使“勇敢者的奋不顾身”声誉扫地，而是为了完全承担革命事业

的责任，为革命的许诺、成就和义务完全承担责任。党作为革命的组织者，应当记住这些义务。没有这一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没有履行和没有完成的东西应当履行和完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预见到了在建设新社会过程中不止一次地需要一切从头改做的可能性。

三、改革与社会主义新视觉

革命改革是根据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倡议开始的。根据这一点，我们报刊有时把改革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并进行各种历史的对照和对比。

但是，我认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把我们社会分成领导人“上层”和执行领导人的思想、指示和行为的“下层”。斯大林在论证集体化时曾使用了这一概念。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反映了他的政权金字塔的观点，这个金字塔的基础就是“下层”，而领导人处于金字塔的顶峰。对我们来说这一概念是来自我们所反对的官僚专横制度的东西，是斯大林主义反民主意识形态的反映，即不是新思维，而是旧思维。

改革，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进程，它是人民用民主方法实现的，是为了人民的，党表现为是人民的政治先锋队。而党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历史性倡议是它的先锋队作用的自然反映。党不垄断探索的权利。任何有益的倡议，不问它来自何处，都是改革所需要的，因为，它的生命力在政治上取决于民主的发展，而民主的职能完全在于刺激人民的首创精神。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对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态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特点的新观点的问题作出回答。

改革把向来就有的革命原则转向现实的实现，因为过去这些原则大多数只是宣布而已。然而现在十分明确地发现，这些原则本身和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基的社会主义标准要求具体化，并考虑世界社会主义经验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过程。

首先必须使其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和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生活本身，它的辩证法，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和危险性，这些都要求各国人民和各国不问其社会制度如何从对抗转向合作。

我们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维护文明负有责任。考虑这一情况，有助于克服对抗态度。但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中，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属于这些文明成就的不仅有简单的道德和正义标准，而且有形式上的权利原则，即大家在法律面前平等，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建立在价值规律作用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现在社会思想意识中越来越明确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商品生产和经济管理方法是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个因素。

我们应该用新的观点来看待列宁的这样一个著名论点：在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结构”。显然，列宁没有彻底发现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这两种形态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公有化水平的接近，这些情况证明，已在起作用的不是纯粹形式上的

机制，而是普遍文明的机制。应该改变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竞赛的内容的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生产数量的增长，或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数量的增长（虽然某些国民经济部门还没有取消这一任务，譬如农业部门），而是节约资源，工艺水平，信息保证。我们应该改变经济标准，使其符合现代性，符合今天的经济现实。这对决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说，我们的钢产量，矿肥产量和其他一些产品质量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给我们“社会主义”特点增加些什么吗？看来，从某个时期起，这些数字是经济发展和发展的十分笨拙的原始指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性的标准应该更多地符合人的利益与需求。而在物质财富生产领域，应该不是针锋相对地提出“赶上和超过”的口号，而是转向更有机地加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如果我们不再在这一领域中同其他国家对立，而是同他们一道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那我们在经济上是有利的。

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问题在于一体化过程。当然，我们不应该照抄西方，但是，我们必须在比现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利用一体化过程的好处。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实质和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希望珍惜地保护和丰富什么价值呢？

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把社会革命的主要动机——解放工人阶级，同解放“全人类”、摆脱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是指这样的自由，它依据人的理智，依据关于个人权利、其他人的生活环境和关于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念，而这种自由同无政府状态、同自私的破坏性的专横行为毫无共同之处。这就说明为什么对自由的社会主义理解是同共同性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集体主义精神不是兵营式的，不是贬低个性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条件下，“个人具有结社和利用结社的自由”。

遗憾的是，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遭到最大的歪曲。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精神，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在大众优于个体的借口下大大缩小了自由的合理界限，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本质。换句话说，从社会主义理想中抽掉了主要的东西——人本身，人的需求，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

在革命后立即就产生了一个不着实际的公式：“社会主义是自由结合的人们的自由劳动”。生活和实践把这一公式具体化了：“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按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应该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在专断官僚主义制度统治的条件下，早就忘记了这一真理。

生产公有化原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这一点也被歪曲解释了。事业正是被形式、宣言、表面幸福所代替了，这种表面幸福是以专断、行政命令、有时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像强行农村集体化时期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应该更具体地看待公有制，既考虑到积极的经验，也考虑到消极的经验。问题首先是不是把公有化说成是国家化，这

是列宁所警告过的，也是后来被忽视了的。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放弃公有化和优先发展公有制的思想，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劳动和不受剥削的劳动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性特点。与此同时，我们反对形式上的公有化，并且正在实际上确立尚未用尽自己的潜力和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提高效率道路发展的各种所有制形式。

社会主义理想的力量还在于，效率问题和劳动生产率问题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力量中是同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它突出的特点。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力量，而不是象有时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它的弱点，如果不把人道主义同鼓励坐享其成混淆起来，不把公正同全面平均主义和缺少任何差别混淆起来的话。

遗憾的是，在社会舆论中，目前还相当广泛地流行着马克思批评过的简单的平均主义概念。现在，许多人常常办事还带着这种情绪。社会主义的公正同按劳分配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不对总的劳动生产率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不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进行实际对比，不把眼前的社会利益同长远的社会利益相结合，那么按劳分配的问题本身就不能够得到解决。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同时也是战略上的长远任务。这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的社会主义的矛盾本身。

社会主义的实质性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在我们的整个历史时期，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始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应当是：随着文化进步和群众觉悟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应当从给予劳动群众的民主变成劳动群众自己实现的民主。看来，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宣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的国家，应当成为这一过渡阶段的标志。遗憾的是，虽然进行了数十年的理论创新，但却没有对政治机制进行某种改变。因此，如同对待所有制关系一样，应当不是抽象地看待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应当同实现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机制结合起来看待社会主义民主。而这些基本原则的使命是保证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法制国家。始终不渝地奉行这些原则，不仅能够保障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发展，而且还能够保障它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这是过去的教训之一，也是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又是改革的现实。

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因此，现阶段确立的全人类价值观具有首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阶级态度的实质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产者运动形成伊始，马克思就强调指出这样一个状况，即“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由此可见，阶级原则的方向符合文明沿着自由与和平道路前进的方向。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对现实生活、当前的社会状况、它的动力和矛盾进行真正的阶级分析。只有认真考虑我们社会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和需求，我们才能在改革进程中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而改革是要克服社会主义的扭曲并使它达到崭新的水平。

四、社会主义的新面貌

现在，我们谈谈最初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往何处去？对社会新素质、社会主义新面貌概念必须赋予什么意义呢？对这个问题所持态度本身，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也是重要的。

卡尔·马克思当时曾写道：共产主义并不是理想，而是社会本身逐渐失去其原先状况的一种实际行动。但是，我们却不顾这种思想，把力量集中在描述未来的某种理想“模式”上，现在社会上发生的变化被强行拖入这个模式中。这个抽象的公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上是强加于现实的。然而，实际生活却经常根据客观形成的条件走另一条道路。企图使实际生活按照现成的公式发展的做法导致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僵化、故步自封、自欺、对人和对历史的专横。

人民已经失去期待的耐心了。没有道理的呼吁和诺言太多了，以至可以对它们不屑一顾了。关于人的利益已经发表了许多议论，但是这些议论很少是以物质和实际行动作后盾的。结果是，国家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的国家，可是并没有为人民群众创造生活条件，而这种条件对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来讲是很自然的。在建设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为宗旨的崭新状况的社会过程中，改革应当消除这种片面发展的怪现象。我们在为目前几代人的当之无愧的生活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在确保我国的未来，即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在阐明和从理论上思考今天人们的根本需求和利益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新面貌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制定与今天的现实相适应，但同时也是意在未来的目标、计划。

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既然建立这样的社会是改革的主要目标，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我们正在建设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宣布这个概念。重要的是，在建立了下述社会经济结构 and 政治结构之后实际革新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要逐渐变成一种手段，而人则逐渐变成了目标，这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实际上要保证整个社会制度面向人的转折。这种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不仅符合博爱的要求或道德至高无上的要求，这种人道主义化对于我国社会来说，现在也变成经济的和社会的需要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改革表明，只有人作为活动的负责主体真正投入全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才能克服人的异化，才能克服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脱节，才能提高个人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只能在对人的投资增加的情况下实现。我们必须彻底意识到，社会发展越强化，社会才会越发达，人本身在劳动中才变得越内行，越美好。因此，对人的投入就是对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严重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国民教育、卫生保健和为人服务的其他行业的拨款，在整个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比例要比我国高得多。这方面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放弃这些领域拨款的剩余原则，因为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符合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观。

改革要求我们这样做，确定前景，确定社会主义的新面貌，我们应当彻底实行人文标准在我国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居先的原则。

在经济领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变化导致了这样的认识：为了使现代生产力取得进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机制，有效地组织和刺激人们的劳动活动。

在进行这些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无须乎放弃众所周知的集中制和大规模计划工作的优越性。我们放弃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以利于民主集中制，从而也就放弃了形式上的、实质上是无力的集中制以利于真正有效的集中制。各主管部门的假集中制应当借助于劳动集体的志愿联合而让位于可靠的管理机制。

改革形成的各种经济机制将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如果劳动人民将成为所有制的真正主体，工人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的话，而这些机制本身不仅代表了社会利益，而且与它们是和谐的，从而也代表了劳动者本人的利益。人们就会看到自己劳动的结果同劳动报酬的联系了。

无疑，在这一改造的过程中也一定会产生经济方向的深刻结构性变化。第一是依靠国防部门企业的转产，加强国际安全、裁军、向无核世界过渡的进程为转产开辟了道路。第二，依靠在总产值中大量增加消费品所占的比重。

结构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属于全人类正在进行的探索的范围。工业化的旧模式正在吞噬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掉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载能体，这种模式已失去前途，这点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明显了。经济的这种浪费结构得以在一个有限时期内，在世界上有限的一部分地方发展。而对于全人类来说，它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因为它根本无力抗拒大自然的力量。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未能占据结构改革领导者的地位，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今天扮演了这个角色。我们避免了由于资本主义世界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产生的社会动荡而感到高兴，可是很晚才发现，那里继社会动荡之后却在高技术、节约能源和原料的基础上实行了能源结构改革。现在，我们正在为行动缓慢和自信而付出代价，其中也包括付出社会代价。实际生活责成我们来证实我们的制度在结构改革领域的优越性。

这项任务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在短期内实行的工业化或战争年代为胜利而组织工业的工作。这项任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指的是切身的利益，是国家的命运。

如果改革在经济上胜利了，即经济稳定性、劳动生产率的应有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都得到保证的话，那么，改革就成功了。社会主义新的经济面貌应当具有这些特点。

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的更新将通过形成文明社会和法制国家而保证真正的人民政权。

在我们这里，就连“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本身通常也引起消极态度，这个术语